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Second Edition)

21世纪的美利坚高等教育 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第2版)

[美] 菲利普·G·阿特巴赫

罗伯特·O·波达尔 帕崔凯·J·甘波特 主编

施晓光 蒋凯 主译

陈学飞 校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

别敦荣 宋文红 蒋凯 主编

21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

——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2版)

[美] 菲利普·G·阿特巴赫

[美] 罗伯特·O·波达尔

主编

[美] 帕崔凯·J·甘波特

施晓光 蒋凯

主译

陈学飞

校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Philip G. Altbach, Robert O. Berdahl, and Patricia J. Gumpor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 Lond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

(美)阿特巴赫(Altbach, P. G.), (美)波达尔

(Berdahl, R. O.), (美)甘波特(Gumport, P. J.)主

编;施晓光,蒋凯主译.—2 版.—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2007. 6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别敦荣,宋文红,蒋凯主编)

ISBN 978-7-81067-815-5

I. 2… II. ①阿… ②波… ③甘… ④施… ⑤蒋… III. 高等
教育—研究—美国 IV. G649.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342 号

图字:15-2005-024 号

21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 2 版)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罗伯特·O·波达尔 帕崔凯·J·甘波特 主编
施晓光 蒋 凯 主译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策 划 宋文红

责任编辑 程君 晓诗

电 话 0532-85901040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1/16

印 张 27.375

字 数 48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1999, 2005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715 Nor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aryland 21218-4363

www.press.jhu.edu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总序一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高等教育引领了国际化的潮流。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知识、技术、人才、信息、财富在国家间流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由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身而言,不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推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渗入了更多的商业气息。商业性的跨国高等教育活动成为一种很大的产业,为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项目的提供者赢得了数额可观的收入。

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很多国家的学生提供了出国留学、了解其他国家文化的机会。在有些国家,本国的学校无法满足人们的入学需求,国际教育活动为这些国家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今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除了传统的出国留学活动、在国外设立分校、承认国外的教学计划或学历学位、在某个国家按照国外的模式独立建校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途径。

在欧洲,随着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欧盟当局积极地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大学生提供在欧盟国家之间的学习经历。欧盟设立的 ERASMUS 等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助,以帮助大批欧洲学生到其祖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学习。现在,“博洛尼亚计划”正在协调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使整个欧洲国家的学位结构相一致,实现学分互认。

在中东地区,尽管政治、军事局势动荡不定,但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仍然十分活跃,形式非常多样化。以色列已经批准波兰在本国建立一所私立医学院,沙特阿拉伯正在与外国投资机构合作建立新的私立大学,哈佛大学正准备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分校,巴林正准备建立一所附属于德国汉诺威大学的新的欧洲大学,埃及已经建立了一所美国大学、一所法国大学和一所德国大学,一所新的英国大学正在创建中。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营利性的私营公司对国际化高等教育交流活动的兴趣有增无减。比如,美国的桂冠教育(原来的森林教育)公司拥有西班牙的马德里欧洲学院、瑞士的雷·罗奇与格连旅馆学院以及法国的巴黎高级

商学院的部分或全部资产。阿波罗国际集团将在荷兰开办教育项目,新加坡的拉夫·拉萨有限公司近来与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签订了一个协议,向许多国家提供其在时尚与设计方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课程。^①

这种由众多国家、国际组织、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参与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但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格局,而且改变了有关国家高等教育的构成与功能。在美国,外国学生每年为美国带来120亿美元的学费收入,外加数量不菲的消费力。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将吸引外国留学生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经济压力的重要措施。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把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学生向海外高等教育机构寻求教育机会和引入国外高等教育资源,作为解决自身高等教育能力不足,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有的国家,如日本,则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扩大自身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手段。尽管不同国家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各有不同,但都表现出了不遗余力的精神。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式更趋复杂,有的甚至是用传统的思维根本无法理解的。

我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中心之一,这不但表现在我国赴国外留学人员数量达到了世界之最,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吸引我国学生留学,很多外国大学试图在我国开展合作办学,我国也在努力吸引国外学生来华学习,而且表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注重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试图在高等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做到与“国际接轨”。不过,在这种高等教育国际化大潮中,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与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并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全世界高等教育人口中,平均每4~5人就有一个是中国学生。我们也有少数办学水平较高、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大学。但是,应当承认,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还较低,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有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很多方面。但是,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我们的高等教育理念、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高等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适应性。

通过改革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国际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换句话说,国际化是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为了配合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关于国外高等

① 菲利普·G·阿特巴赫,简·赖特.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景展望:动因与现实(未发表)。

教育的研究,译介了一批国外高等教育学术著作和相关资料。不过,就高等教育工作者的需求而言,有关国外著作的译介是远远不足的。

2003年开始,我们与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受到了各地读者的热情欢迎。2004年我们与好朋友阿特巴赫教授商量,向读者译介更多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所启示的国外高等教育著作。阿特巴赫教授向我们推荐了他主编的部分研究著作,并慷慨地无偿赠送部分著作的版权。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国际合作,不管是选题的涉及范围还是译介著作数量都超过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阿特巴赫教授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并不时给我们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友好合作和鼎力相助,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套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的。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包括三大主题:一是国际教师职业;二是亚洲大学的演变与发展;三是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毫无疑问,这三大主题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将为我们开启一扇扇新的窗户,对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丛书的大多数作者属于国外人士,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与我们有差距。我们尽量按照原文翻译,但并不表明我们完全赞同其观点。有了解才有批判与借鉴,希望读者诸君在了解其观点的基础上,吸取其有益成分,摒弃其片面甚至错误的成分,以促进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别敦荣 宋文红 蒋 凯

2005年12月

《国际高等教育译丛》总序二

比较的视角常常是有益的,对于理解、对于政策,或者哪怕就是对于分析其他地方在如何工作都是有益的。高等教育尤其适合于比较的和国际的视角,因为学术机构都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组织 and 知识之根基,而且当代大学有着许多共同的传统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大学的结构、学术专业的功能与结构,甚至课程的构成要素都是相似的。

现代大学也是国际性的。知识没有国界,研究与分析在世界范围内交流。研究方法和知识范式有着国际影响。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跨国求学和作研究。中国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许多中国研究人员和学者也花时间游学海外。学生和学者的留学潮大量的是从发展中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到工业化国家,而且知识的流向也是不平等的。

其他国家和制度的经验有许多值得学习,与此同时,将国情牢记于心亦是重要的。太多的教训是,人们在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时忽视了当地的需要和条件。极少有外国的范例能够被直接效仿的。借鉴往往需要一个创造性的适应过程,而且有时根本没有什么相关性。然而,即使是不直接相关的外国的事例也可以带给我们消极的经验教训——其他人所犯的错误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我希望该丛书有益于中国读者。它提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激发思维,指明革新和政策的可能方向。中国有着丰富的学术传统,在借鉴其他可能的选择时应当谨慎从事,而且应

当确保能够满足国家的需要。

对高等教育而言,国际传统的某些要素——学术自由、学术专业的核心作用、英才价值的诉求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等,都对对中国学术制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大学需要在国际背景下办学,参与国际交流,在研究方面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并在世界范围传播知识。

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理念就是,人们可以从比较和国际的视野中学到很多东西,批判性的透视能给解决复杂的问题以启示。对高等教育而言,这一国际化的努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菲利普·G·阿特巴赫
2005 年 12 月

目次

导论: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	罗伯特·O·波达尔
..... 菲利普·G·阿特巴赫 帕崔凯·J·甘波特(1)	
1. 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	菲利普·G·阿特巴赫(10)
2. 美国高等教育的十个时代	罗杰·L·盖格(29)
3. 自治与责任:谁在控制学术界	福兰克·A·斯米德林 罗伯特·O·波达尔(54)
4. 学术自由:过去、现在与9·11之后	罗伯特·M·奥尼尔(69)
5. 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阿米·朱司曼(88)
6. 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	
..... 劳伦斯·E·格莱迪 杰奎琳·E·金 麦兰尼·E·柯里根(124)	
7. 州政府和高等教育	小艾姆斯·C·麦克林奈斯(151)
8. 法律环境:大学校园中的法律变革	麦克尔·A·欧利瓦斯(172)
9. 看不见的手:外部团体及其影响	弗雷德·F·哈赛尔罗德 朱迪斯·S·伊顿(197)
10. 严酷的现实:大学教师面临一个新的世纪	菲利普·G·阿特巴赫(223)
11. 变化背景下的大学生	艾利克·L·戴 塞维亚·赫塔多(245)
12. 大学校长领导的两难处境	罗伯特·伯恩鲍姆 皮特·D·艾克尔(266)

2 21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 2 版)

13. 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谁应该付费
..... D·布鲁斯·约翰斯通(286)
14. 技术与高等教育:新时代的契机与变革
..... 帕崔凯·J·甘波特 马克·查(307)
15. 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相互依存与张力
..... 帕崔凯·J·甘波特(331)
16. 高等教育课程:当代问题的历史根源
..... 迈克尔·N·巴斯特多(360)
17. 高等教育市场:70 年代的学生,80 年代的专利,90 年代的版权
..... 希拉·斯劳特 格瑞·罗德斯(379)
18. 高等教育种族问题:从模糊移动的目标中获得意义
..... 迈克尔·J·常 菲利普·G·阿特巴赫 科菲·洛莫蒂(404)
- 作者简介..... (420)
- 译后记..... (424)

导论: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

罗伯特·O·波达尔 菲利普·G·阿特巴赫 帕崔凯·J·甘波特

本书希望把握住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中几个重要动态的连接点。近年来,高等院校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许多方面不断受到媒体的关注。时下,有关自由市场经济价值的问题不绝于耳。人们可以相信从总的社会和更广阔的经济制度到具体的学界殿堂,改进和繁荣高等教育的正确路径是走分散管理、分权制、私有化、全球化、信息技术、再造政府、全面质量改进(TQI)的道路。其他途径还在不断出现。我们被明确告知,获取权力并尽可能地接近操作层面,是利用权力的最明智模式。我们也目睹了营利性供给者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技术能力可以实施远程教育。这些新风险投资中的新参与者乃至某些观察家都赞同这些重点强调效率、扩展生产税收能力的新型组织形式。其结果就是,人们不再相信传统院校和州的疆界。根据这些观点,在设计另一种未来的讨论中,他们会把这些看成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显然,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种骚动的状态。当然,并不是现在才如此。上面所列问题与本书第一版中所确定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课程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以种族为基础的录取程序、校园暴力和仇恨犯罪、研究生助教发起的罢工活动、针对州政府的问责制、学生学习评价、监督教师生产力、科学活动中的不当行为与欺诈、校产合作关系、技术转移、大学非直接成本经费的不当管理以及最近才出现的州议会所要求的削减经费与缩小规模等问题。

这些问题依次是按照美国高等教育早期的批判标准确立的,如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所写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年)和丁纳仕·D·索扎(Dinesh Souza)所写的《狭隘的教育》(1991年)中的标准。^[2]尽管本书的三位主编都认为,所有社会机构都不应该从批判角度加以考虑,但我们也许应该让读者知道,我们并没有察觉到最近已经被平息的责难风暴。因此,本书的其中两位主编(阿特巴赫和甘波特)主编了另外一本著作《为美国高等教育辩护》(2001年),而波达尔经常引用另外著述的观点:一个是罗伯特·伯恩鲍姆

(Birnbaum)的《高等教育管理的遐想》(1999年),另外一个是他与人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危机之“危机”》(2001年)。^[3]伯恩鲍姆认为,诸如 PPBS、TQI 和再造政府等运动都在广阔的社会中被实验,有时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最终它们会在高等教育中实验时因缺陷而前功尽弃,无法取得成功。在《高等教育危机之“危机”》一文中,他尖锐指出,抱有良好意愿的人们都已预见到高等教育不仅是未来数十年而且是几个世纪后的失落和衰败!尽管美国高等教育肯定存在缺陷,但从世界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高等教育都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斐然成绩。

这并非意味着不允许人们继续批判美国高等教育。相反,他们的这种努力应该受到认真评价,看批判究竟带来怎样的改进,看当批判超越了准确的尺度时是如何被辩驳的。我们希望本书将会让读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实和未来的状态得出自己的判断。

在美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分权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全面地分析 20 世纪日趋紧张的关系和转型的经历是困难的。需要再评价的重点少了许多,高等教育得以生存和繁荣。然而,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考察高等院校事物仍然具有分析性的功用。因此,本书主编以及作者都认同这样的观点:高等院校是镶嵌在广阔社会之中并受制于社会力量约束的机构。

在尝试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批判合法性的评价过程中,把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带进这个过程是有益处的。这就是为何本书第一编的若干章探讨、比较世界参照中的美国高等教育(这种比照有利于表明,其他国家至少也正在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的问题进行抗争)和历史维度中的美国高等教育(它有利于表明,美国高等院校与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长期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

第一编中还涉及自治、责任、学术自由等基本问题并对新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总体论述。

第二编“外部力量”分析了主要外部团体(联邦政府、州政府、司法系统和非政府因素)的作用。

第三编“学术社会”涵盖了内部团体(教师、学生和校长等)的作用。

第四编“21 世纪主要的议题”涉及对一些主要的问题(财政、技术、研究生教育、课程、种族以及德理克·伯克(Derek Bok)最近所提出的概念“高等教育商业化”)进行的更为详细的分析。^[4]

事实上,我们三人已经对自己及本书作者提出了以下一些宏观的问题。如我们假设高等院校是社会机构,那么它们今日的面貌如何?是什么力量(无

论是当代独特的,还是从过去延续下来的)在塑造高等教育?在21世纪美国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未来是什么样?

作为社会机构的大学

大学以及扩充后的许多四年制和二年制中学后教育机构通常与其所处的社会保持某种模糊关系。它们既是参与性的,也是远离性的;既是服务性的,也是批判性的;既需要社会支持,也是社会所需要的。艾利克·阿什比(Eric Ashby)这样来确认这种模糊性所带来的主要困惑:一所大学“必须有足够的稳定性,以便支持其创建时的理想,同时也要充分地对支持它的社会作出回应,以便维持其与后者的联系”^[5]。

欧洲中世纪大学在遥远的教皇统治之下发展成为超越国家的机构,并在一种单一文化气氛中运行。这也使它们把对“高级”的职业性或专业性的实际学习与对普遍真理的追求结合起来。后来,当民族国家取代天主教会成为控制大学的主要权威时,大学仍然能够经常保持相当的自治权。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注意到许多中世纪大学是多么具有稳定性。他指出:“有大约85所1520年以前建立的西方机构迄今仍然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它们具有相似的功能和未间断的历史,其中包括天主教会,曼岛(Isle of Man)、冰岛以及英国的国会,瑞士的若干州府以及70所大学。”^[6]

当然,在下列情况下,即当只有少部分年轻人可以上大学,当学生的课程不外乎只开设“三艺”和“四艺”,当国家几乎不必提供任何经费时,国家比较容易赋予大学自主权。然而,在19世纪,有三项发展加剧了自治权与责任制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从德国大学开始,随后扩展到西方其他国家的一项观念,就是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各国政府开始看到了大学、经济增长以及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其次,1862年颁布的美国《莫雷尔法案》将大学课程扩展至包括农业和机械工艺在内的内容。这就导致高等院校多样化的出现、大量异质性学生的增加、州政府支付较高办学成本、大学公共服务观念的产生。像德国大学一样,美国模式最终传播到其他国家。第三,公众和政府越来越不愿意增加公共支出,因而增加了高等院校的责任并使其发展受到了限制。

马丁·特罗(Martin Trow)说明了自治权和问责制两分概念是如何伴随高等教育从“精英”系统向“大众”系统演进而改变的,即从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人数占适龄人口15%以下演进到占适龄人口的15%~50%之间。^[7]特罗也

考察另外一种转变的可能结果,即达到“普及化”招生,但这种普及化只在几个州曾经被尝试过。

在目前这个时期,有人提出质疑:招生大众化是否有用?高等教育是否是一种公共产品(public good),主要恩惠于社会,并由此值得用公共经费来支持?或者高等教育是否是一种私人产品,因直接恩惠于个人而应该由个人承担成本?^[9]有些人逐渐看到,高等教育是一种成熟行业,其扩张将非常缓慢;关于学术事业性质的基本假设将聚焦在“稳定”上,而不是增长上。^[10]

定义问题

“自治权”(autonomy)与“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两个术语乍看起来似乎不存在语义上的困难。简单地说,自治权就是没有外部控制的管理权力。“问责制”就是需要能够向外界团体展示负责的行为。在理论上,在高度自治性和严格责任之间并不必然有不相容的地方。然而,在实际中,在要求有更多问责制的情况下,自治权剩下的很少。理想上似乎是做到两者平衡,太多自治权可能会让大学对社会不作反应;而太多的问责制又可能摧毁学术精神。

然而,这种两难实际还更加复杂。例如,假设学术人员抱怨外界干预了院校的自治权,那么人们就可能想知道有问题的行为是什么。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权并非一码事,学界的反应应该反映出两者的不同。我们需要区分三个与自治权相关的概念。

(1)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是指个别学者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不会因为冒犯某些政治学、方法学、宗教学或者社会上的正统看法而担心受到惩罚或者被解聘。

(2)实际自治权(substantive autonomy)是指高等院校以法人形式决定其目标和课程的权力(即学校内部事务)。

(3)程序自治权(procedure autonomy)是指高等院校以法人形式决定其目标和课程被实现方式的权力。

上述三种权力显然是互相关联的。例如,一个享有实际与程序自治权的大学,通常能比较好地保护教师的学术自由(虽然19世纪早期时,具有自治权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拒绝给教师学术权力,而没有自治权的柏林大学却以教授自由,即学术自由而闻名)。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烦琐的政府控制程序将会严重阻碍大学实现所选择目标的能力。尽管在真实生活中这些范畴还有些模糊,但区分这三个概念将有利于我们考察高等教育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阿什比将“学术自由”想象成一种“国际公认的明确的大学教师特权，无论其在任何时候，以何种方式受到挑战都必须得到保护”，即使“构成大学自治权的内容不清楚，且适合不同国家大学的自治模式是非常多元的”。^[11]因此，在探索自治权问题时，有必要先搞清楚干预是程序上的还是实际上的问题。程序上的干预（针对采购、人事以及某些资本建设的审核和监控）可能对高等院校造成很大的干扰，甚至也经常阻碍效率，但这并不经常阻止高等院校实现其目标。相对地讲，如果政府的行为影响了实际上的目标，那么高等院校的本质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敏感的领域，人们需要的是在政府和大学角色之间进行协商，以便把权力区分清楚，决定谁才应该对有关高等院校的事情作决定。在阿什比看来，自治权的真正保障在于确保“公众、政治家以及公务员能够广泛地了解”自治权的“基本要素”：^[12]

——大学能够选择教职员和学生并决定将他们留在大学中所需条件的自由。

——大学能够决定课程内容和授予学位标准的自由。

——大学能够把经费分配到不同类型公共支出（在可用的额度之内）的自由。

“问责制”的定义也必须加以考察。当我们要展示“负责任的行为”时，会遇到下列问题：是什么构成这些行为？谁来决定报告过程的形式和内容？对不恰当的表现的惩罚会怎样？除了要在事前提供有关计划、项目和预算方面的信息以便证明公共税收被有效地应用之外，高等院校还必须在事后承担责任。事后进行查账的方式至少有三种（为法律、为效率以及为效能的），其结果各有不同。传统上，政府的事后审计工作重点在于法律和效率两方面。经过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事后审计对高等院校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使之在运作程序上做得更加谨慎。一般说来，这些压力并不会迫使院校改变其实际的目标。然而，一场有关问责制表现的审计运动正在州级兴起，其重点在于检查政策方面的效能。如果这样的发展扩展到大学里，将会大大影响院校的实质层面。^[13]

从上述的讨论可以得出三点启示：首先，各级政府应该远离那些会威胁在高等院校中承担教学与研究任务的人员的学术自由事情；其次，政府在程序上的控制很可能会降低生产力，这虽一定会令人气愤，但不会被认为是威胁学术自由的暴行；第三，在实际自治权的重要层面上，政府和大学应该组成伙伴关系——其中即使力量的天平明显倾斜在前者，但必须建立州对问责制关切和